

2505

# 威信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 威信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威信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主 审:**

邓培基

熊真伦

刘诗正

**主 编:**

何沛魁

**编 辑:**

张人文

肖世阶

**书面设计:**

黄 河

**书面题字:**

曾一平

**校 对:**

邓培基

熊真伦

姜成豪

何沛魁

## 目 录

- 回顾在扎西的战斗历程  
.....陈彪口述 雷吉常整理 ( 1 )
- 忠贞肝胆气豪迈 艰苦奋斗十二载——殷禄才烈士生平事略  
.....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办公室 ( 11 )
- 龙堡坝攻坚战  
.....杨映村 ( 20 )
- 击毙陇承尧 解放威信城  
.....赵 沛 ( 24 )
- 攻克天险蜂岩洞  
.....赵 沛 ( 28 )
- “反共救国军”团长姚启贵覆灭记  
.....熊清龙 ( 31 )
- 威信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产生始末  
.....刘诗正 何沛魁 ( 36 )
- 云南省剿赤宣传总队在镇、威的反共活动  
.....崔龙光口述 何沛魁整理 ( 40 )
- 关于“剿赤宣传队”的几段资料  
.....邓培基 ( 51 )
- 威信行政委员会公署监狱几次被劫持的经过  
.....刘行高口述 何沛魁整理 ( 54 )

解放前威信工商业概况	李德厚 (66)
解放前威信县银行两次筹设内幕	刘行高 (70)
解放前威信的税收情况	张维卿 (74)
抗战初期航空救国款募捐和使用情况	肖世阶 (77)
在日军集中营里的中国战俘	徐东平口述 邱秀春整理 (81)
威信几次参加反龙(云)战争的情况	邓培基 (85)
黔军旅长郑绍尧在滇黔川边区的活动	邓培基 (91)
参加护国战争的扬春芳	邓培基 (100)
牟荣华、田洛九进占威信	邓培基 (102)
扎西地区反清战士——肖大扁刀	刘行高 张维英 (106)
记威信从医四十余年的中医张懋昭老师	王良知 (110)
对鸦片的控诉	邱秀春 (115)

# 回顾在扎西的战斗历程<sup>①</sup>

陈 彪<sup>②</sup> 口述  
雷吉常 整理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四川赤化。当时我在三军团五师十五团任副特派员。在贵州土城同川军作战中，我右腿负伤，战士们用担架把我抬着走。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由于四川军阀沿长江布防，红军主力折向云南威信扎西地区前进。我们来到叙永天堂坝时，军团保卫局长张纯清找我说：现在形势很紧张，部队抬着你走，也很困难。决定暂时把你寄在这个地方养伤，待伤好后再来追赶部队。我本来不愿意离开大部队的，但想到大

家抬着我走这么远的路，的确也很辛苦，所以我只好同意留下。

部队把我寄在天堂坝一位苗族家里。同时在这个寨子寄养的伤病员有一位营长和一些连排干部，共计十多人。还留下护理员和药品。我在这位苗族家里医治疗养了几天，能拄着棍子走路了，我就急于追赶部队。此时听说红军主力在扎西集结休整。这位苗族家只兄弟两人，对我很好，我赠送他两块大洋，临走时他弟弟还送我一程。

到分水岭，遇着五龙山游击队（即叙永特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是川南地下党员王逸涛组织起来的。加上我们红军伤病员共有180人。王任司令员，何宗舟（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总支书记）任政委。分为三个中队：一二中队是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身体较弱人员组成的；三中队是当地杨登高的绿林武装，有六七十人。多用土枪、马刀，战斗力弱。五龙山游击队，在五龙山、天堂坝、树坪、分水岭等地活动。何宗舟同志告诉我，要我不要回红军主力部队去了，就留在游击队，边养伤边工作。我同意了。何安排我做群众的宣传和组织武装工作。

1935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缩编部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扩大红军，开辟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我到五龙山游击队不几天，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冠怀、新编师师长刘干臣、三军团六师参谋长曾春鉴等带着一支大队伍过来了。其中有保卫局第五连。这个连人员整齐，装备精良，打仗勇敢，配备有四挺水机关枪和一

部电台，共有四百多人。

我们在树坪的庙门前迎接他们。部队到达后遂在一座瓦房里开会。徐策在会上宣布说，我们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设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下编为五个大队。司令员王逸涛，副司令员曾春鉴，政治委员徐策，政治部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特派员龙厚生，供给主任杨德胜，地方工作团主任张梅凤，秘书阙思颖，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还有侦察排。这批人机智勇敢，都是经过挑选的。五个大队，即五龙山游击队的三个中队改编为三个大队，中央红军在扎西留下来的编为第四、第五两个大队。第五大队是国家保卫局第五连的原班人马。会后，党员中宣布在扎西成立的中共川南特委，徐策同志任书记，委员有王逸涛、余泽鸿、戴元怀等人。后来又增补刘干臣、曾春鉴。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经常用电台与中央联系。原五龙山游击队政委何宗舟因身体不好，没有安排其职务，仍留地方养病。

红军游击纵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特委率领这支队伍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与牵制敌人，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成立初期，指挥有方，部队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声威大震。这段时间，为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北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时而称川南游击纵队，时而称云南游击纵队，时而称贵州游击纵队，积极穿插，游击转战，奇袭敌人，战果累累。四川军阀刘湘惊慌失措，摸不清川南究竟有多少红军，急忙调兵遣将，防守红军北渡长江。滇军孙渡得悉黄港咀还有一支红军，深恐乘隙入

滇，派部回守滇境。与此同时，我红军游击纵队在木厂梁子击溃川军一个营，大石盘冲破川军一个团和江安、兴文等四县保安队，水田寨赶走镇雄独立营，牵制了敌人一大部兵力。几次大的战斗，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一次，我们进攻筠连县城，敌军一营人驻守，闻听红军游击队来了，县长和敌军被吓得弃城而逃。我们占领县城，缴获不少物资和武器装备，打开监狱救出了二百多名无辜群众。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这段时间的地方工作也是有声有色的，在许多地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农会，有一些街子上建立了贫民会。还有的地方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地方武装，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的群众，广大民众也很拥护红军游击纵队。曾记得在威信、罗布坳、斑鸠沟等地建立了贫民会，大雪山、郭家坟、马家坝、水田寨、簸箕坝、长官司等地建立过农会和发展了党员。这些地方的群众与游击队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游击纵队第一次出击川南回来，王逸涛就借故逃跑投敌了。杨登高的绿林武装也随之离开我们。王叛变后，徐策在马家坝召开大会讲话说：王逸涛经不起革命斗争艰苦环境的考验，已经叛变投敌了。今后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审判他，枪毙他。并在会上宣布开除了王的党籍，撤销他的职务。号召大家要坚定革命信心，坚持战斗，直到革命胜利。王的叛变，没有带着人走。杨登高的队伍离开我们，关系也不大。因为他们打仗不行，平时作战我们基本上没有要他们参加。对我们损失大的，是我们在农村建立的许多关系和一些组织，由于王的叛变，均被出卖和破坏了，给我们做群众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游击纵队使用的电台，开始还经常同中央

联系，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机器坏了，又没有汽油和电池，就在煤洞场把安埋了。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在贵州留下的黔北游击队，由司令员陈宏，政委张风光领队来到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两队会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改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的建制是：司令员刘干臣、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参谋长陈宏、特派员李青云、供给主任杨德胜、地方工作团主任钟昌桃、副主任陈兴才，龙厚生管组织，阙思颖管宣传。司令部有侦察排、卫生队。司令部的指导员李桂洪。合队后有八九百人，编为两个支队。一支队原川南游击纵队，二支队原黔北游击队，两个支队各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一百多人。在朱家山大地坡召开会师庆祝会，搭了戏台表演文艺节目。附近十多里地的群众都来观看。地方工作团还将没收来的谷子、衣物、猪肉等分给贫苦群众。从此，更加扩大游击纵队的政治影响，燃起了燎原烈火，三省军阀惶恐不安。

由于游击纵队声势浩大，活动频繁，给统治阶级造成极大威胁，三省军阀先后派出正规部队八九个团来追剿游击队。朱家山会师后，计划到南六的兴文县。部队到达长官司稍事休整，第二天清早出发时受到川军一个团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我们与敌人死打硬拼，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从早上打到下午才撤出战斗。张风光副政委在战地牺牲了，有的负伤后不知下落。伤亡人员大部未抬下来，直到晚上才转移到簸箕坝。在簸箕坝宿营时，余泽鸿召集会议，宣布由他担任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大队一级干部调整补充，决定游击纵队到大雪山安尾坝休整。

部队经过整编，仍转到川南的高县、珙县边境，辗转活动，取道镇雄，进占赫章，打进筠连城，巧取叙蓬溪，威逼泸州、宜宾。1936年底，游击纵队由贵州地界转回云南再到四川。敌人集中兵力加紧“围剿”。余泽鸿在长宁贾家弯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为两支活动。我在一支队跟随司令部，突出敌人包围后，只剩下四五十人了。在江安、古宋边境的一个地方宿营，余泽鸿政委便在这天晚上牺牲了。刘干臣因病寄养。我们在特派员李青云、参谋长刘复初的带领下，向连天山转移隐蔽。在连天山上坚持了近两个月，敌人今天搜这座山，我们转到那座山，明天搜那座山，我们又转到这座山。白天在山里转，晚上才摸到老百姓家求宿。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加之时值严冬，衣服穿的单薄，寒风刺骨，坚持一个多月，敌人搜不着我们，只好佯称游击队已被消灭，将队伍撤走。

1936年春，我们由连天山下来，又带着二支队被打散的龙厚生、黄虎山等人，在古宋、长宁、兴文、珙县边境坚持游击战。此时得知红二六军团已到达黔北。为配合红二六军团作战，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赶跑了兴文炭厂守敌一个营。部队向滇黔边活动，又不断补充和发展起来。

纵队到达罗布坳，曾春霖参谋长原来在那里养伤，伤重带回一些人到部队。养伤期间，曾还在那里建立有一个党支部，发展有几名党员。支部书记是一位小学教员，名叫叶培根。

1936年6月，红军游击纵队转移到镇雄花脚坝，有在毕节兵变的陶树清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的队伍来找我们合队。阮、陶共有六七百人。在威信院子场商谈合队

事宜。陶表示说：他们起义是为了革命，为求解放。于是将阮、陶的队伍编入纵队，统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下设三个支队统一行动。这时游击纵队只有七八十人，编为第三支队。陶的部队是刚从国民党军队里起义过来，纪律性差些。我们同他们活动二十来天，龙厚生等同志说他们不听我们做工作，还散布要收拾我们，提我们的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耐心地做工作，就脱离了他们单独分开行动。不久，听说阮、陶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中被打散了。

离开阮、陶的队伍后，游击纵队转移到罗布坳，有老乡前来报告：从四川来了川军一百多人整装，住在对面山上。纵队即派人侦察，果然如实。还带回来两名代表要见红军司令，自称是川军起义的代表。红军游击纵队热情接待。原来他们是刘湘暂编第一师三团的一个连，在珙县底洞铺举行起义。听说红军是抗日救国之师，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官兵平等，不打骂，团结友爱。他们打死连排长，由刘少成、兰澄清带领前来投奔红军，请求参加革命队伍。他们将队伍带下了山，与红军游击纵队合编。这一连人佩有机枪和六〇炮，武器尚好。我们在簸箕坝开大会欢迎他们。人员扩大后，游击纵队改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长高良民，指导员贺东朝；二大队长易德胜，指导员陈兴才；三大队长刘少成，副大队长兰澄清，指导员曾广胜。此时纵队建制：司令员刘复初、政委龙厚生、参谋长曾春鉴，特派员李青云。

游击纵队迅速发展 to 三四百人，继续活动在川滇黔边区。曾在威信的烂泥坝击溃滇军补充团，在贵州燕子口截击军阀杨森商货一百多挑。约在十一月中旬，我因病发高

烧，走不动路，纵队把我寄养在大雪山脚，后又转移到水田寨，躲避在艾宗藩部下一位张班长家。因滇军搜剿严密，又转到叙永分水岭沙家沟，在刘保长家里住了半年多。此时听说游击纵队在三省重兵的“会剿”中失利，多数领导人都先后牺牲了。

我来到扎西找到邝善云。邝是闽赣苏区青年团书记，长征时腿部受了重伤寄养在大河滩，1936年5月才到游击队里来的。在纵队任侦察参谋，与阮、陶部队合并时任二支队政委，参加特委为特委委员。纵队失利后，他来到扎西，找着县长李涤尘。因国共合作，李县长也有些进步，不杀红军。李向我们吹嘘：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曾参加护国军任营长，认识朱德。前期曾杀有红军，而今形势所迫，还收容了不少红军人员。我们在扎西为动员抗日力量上前线，将失散在扎西的红军游击队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开展活动。我们这个支部有党员邝善云、贺东朝、高良民和我等人，邝任支部书记。这时，我们给延安李富春、彭雪枫写了信。给我们寄来了护照和路费。由于贺东朝等人不愿意走，想做点买卖营生留在扎西。1938年1月，我同邝善云二人几经辗转到达武汉。经办事处介绍转赴延安，投身到党中央的怀抱。

至于郭家坟组织队伍的殷禄才、陈二排，我只听说过，郭家坟有人来与我们联系。陈二排是原来国家保卫局第五连的，在纵队中人称他二排长。1947年我在东北，听说川南还有一支游击队在活动，我立刻感觉到我们留下的那批红军人员又干起来了，殊不知是陈二排、殷禄才的活动。在川滇黔边区我们还对许多绿林兄弟搞过统战，经了解可靠和信得过

的发展为党员，支持一些武器，要他做好群众的发动工作，宣传组织，条件成熟了再来报告，批准建立政权。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地方工作团是做的比较多的，也就播下革命火种，让它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远离党中央，孤军深入敌占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地在云贵川三省边区进行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创建根据地，与数十倍的敌军周旋战斗，牵制国民党军队和二十多个县团队的兵力，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同时打击反动区、乡政权，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粮食、浮财分给贫苦民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当地群众仍然流传着歌谣：“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往回跑，打倒军阀妙！妙！妙！”红军游击纵队由于没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长期得不到休整，供给无法保障，伤病员无处安置，致使在敌重兵的“围剿”下，主要领导人的牺牲，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火种，如燎原烈火，熊熊燃烧。红军游击纵队发展的云南、贵州、川南游击支队仍然坚持战斗到1947年。回顾这段坎坷曲折的战斗历程，数百红军指战员的热血洒遍了这块土地，不少红军人员受伤致残流落他乡饱受饥寒。他们这种崇高的品德和献身精神，将鼓舞着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们更加努力，奋勇前进！

注：

① 本文根据陈老几次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名陈兴才，江西寻乌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地方工作团副主任、大队指导员。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顾问。

# 忠贞肝胆气豪迈 艰苦奋斗十二载

## ——殷禄才烈士生平事略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川滇黔边区游击根据地郭家坟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场大规模的“围剿”，被屠杀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二百多名。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共产党员殷禄才，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五岁。

殷禄才，字国清，外号骡子。云南省威信县郭家坟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生。父亲殷崇明是屠工，与人宰猪摆摊为业。母亲杨氏推浆磨水做粑粑豆腐营生。五岁时父亲病逝，由叔叔殷吉安当家，日夜操劳，将营业积蓄的钱购置了四十多担租的田地。不几年，叔、婶亦先后病故，只剩下母亲带几个姐姐和他一起过活。

殷禄才自幼聪颖机灵，秉性刚强，疾恶如仇。少时在郭

家坟读了四年私塾，就参与母亲掌管家务。自卫大队长张占云以殷禄才占据两房家产为因，摊派多出钱纳粮购买枪弹办团，被迫迁到四川珙县洛亥座家。佃土耕地兼做买卖。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红军路过云南威信，播下革命火种，宣传红军的主张，号召工农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严惩各地欺压百姓对抗红军的贫官污吏、土豪劣绅，为民除害平愤。党和红军的宣传使殷禄才看到了希望，他立志冲破命运的枷锁，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以武装斗争寻找出路。他邀约几个人拦截了追剿红军掉队的两名川军士兵，夺获两把刺刀和两袋子弹，到高田为自卫大队长陈正杰“保家”，拖出五支步枪一支手枪五百余发子弹，接着在滇川边境之王场、中心场收缴了几个乡队长的几支枪，组织起十多个人的武装，开始了农民武装斗争的游击生涯。

一九三五年秋，殷禄才感到农民武装力量单薄，难也抵抗反动势力的进攻，毅然找到坚持武装斗争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特委和纵队），要求参加革命。特委和纵队领导得知殷禄才乃逼上梁山的阶级兄弟，便同他讲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游击纵队的任务，勉励他在本地坚持积蓄力量，积极开展斗争，并同纵队保持经常的联系。殷禄才接受党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心中有了方向，回到郭家坟后，加强了农民武装的思想教育，广泛串联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以“打富济贫”和“为穷人打天下”为宗旨，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武装活动。

一九三六年夏，纵队来到郭家坟地区时，殷禄才前去会见纵队领导，特委为在滇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增强游击武